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 1949—1980 / 李海文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8

ISBN 7-220-06959-6

I. 中... II. 李...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件—1949~1980 IV. G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3460 号

ZHONGGONG ZHONGDA LISHI SHIJIAN QINLIJI

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 第二编

(1949—1980)

李海文 主编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李洪烈
王定宇
彭小柯
戴雨虹
叶 勇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26mm×152mm

印 张

21.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6959-6/K·1024

定 价

3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5910167



【目 录】

CONTENT

◆ 终生难忘的开国大典转播工作 丁一岚 / 001

我和齐越兴奋而又认真地交替朗读着广播稿，把眼前这一幕幕动人的场面及时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 秦城监狱的由来 姚 伦 / 006

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是 1915 年建造的。先后关押过国民党首要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美蒋特务等。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并由此上了法庭。

◆ 召开八大前后片断回忆 李雪峰 / 011

党的八大是 1956 年 9 月 15 日在现在的政协礼堂开幕的。在此之前我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加了八大从筹备到召开的工作。

◆ 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林蕴晖 / 020

朱可夫，苏联元帅，1957 年 10 月 27 日前为苏联政府的国防部长。关于 1959 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其起因是彭德怀在 1959 年 7 月 14 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马贵凡译 / 031

1958 年苏联提出：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由中苏共建电台。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又提出中苏合建一支潜艇舰队。毛泽东表示这两个问题涉及主权。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会谈。

◆ “大跃进”在安徽亳县 梁志远 / 059

从 1958 年 5 月到 1961 年 6 月……亳县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加之旱灾影响，广大农村普遍发生了荒、逃、病、死等现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目 录】

◆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 1959年10月2日会谈记录 马贵凡译 / 082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从美国突然直飞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活动，于是有了10月2日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

◆ 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到莫斯科会议 阎明复 / 101

赫鲁晓夫利用会议，精心策划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了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彭真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了他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行为。

◆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王效挺 黄文一 / 144

“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下炮制的。康生自白：聂元梓“是混账王八蛋也要支持”。大字报对北大、北京市以至全国起了恶劣影响。

◆ 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的一着棋 汤聿文 / 162

1971年1月至1974年2月……我接受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一项特殊任务：将一些老干部接到阜外医院就医，实际是把他们保护起来。

◆ 林彪的卫士长不得不说 李文普 / 168

我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多年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是“九一三”事件和林彪、叶群、林立果出逃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的受害者和主要见证人。

◆ 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 高振普 / 192

中办副主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来电话，说有紧急事情向总理报告。当听到“256号飞机失事”报告后，总理两肩一张，满脸带笑，说了一声“摔死了”，随后……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118厅。

◆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 张化 / 203

从总体上看，导致1975年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的原因，既不在于刘冰等人写了一封反映问题的信，也不在于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根本原因在于1975年的历史环境。

◆冒险上书——向毛泽东揭发迟群的前前后后 刘冰 / 214

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

◆粉碎“四人帮”的实施过程 武健华 / 248

晚7时55分，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晕了头脑。张春桥像坍了架。江青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当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正好是8时30分。

◆临危受命，稳定上海 丑运洲 / 282

——苏振华上将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临危受命，紧急行动接管上海。突破要害，擒贼擒王暴露余党。查清罪行，把“四人帮”送上历史审判台。开放引进，加快建设造福一方。

◆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武健华 / 329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表现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8341部队夜奔秦城，将“四人帮”交由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审理林彪、“四人帮”两案 李海文 刘荣刚 / 336

——访凌云

1980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判委员会。……由彭真出来负责，成员包括彭真、彭冲、江华、黄火青、伍修权、赵苍璧、王鹤寿7人。预审“四人帮”是在秦城。黄、吴、李、邱关在总政看守所……审判是在空军学院。



丁一岚、邓拓夫妇。

丁一岚（1921—1998），福建福州市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任河北平山县妇救会副主任和专区宣传部长、《晋察冀日报》通讯员、《晋察冀日报》编辑，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建国后历任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科长，北京市广播电台台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室副主任兼播出部主任、对外部主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台长等职。1943年3月与《晋察冀日报》总编辑邓拓结为夫妻。

终生难忘的开国大典转播工作^①

□丁一岚

从1945年我在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广播电台的工作，至1985年离休，整整干了40年。至今刚好半个世纪了（其中有7年是在播音工作岗位）。

光阴荏苒，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但是，在国家、民族的历史上，在个人的经历中，有些重大事件，却是终生难忘的。194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工作，那一幕幕情景，永远生动而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在中国人民的广播史上，这是第一次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转播，由所有的地方电台联播。早一个多月以前，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廖承志、李强、梅益、温济泽、李伍等同志，就主持制定大典的整个广播工作计划，分工领导编辑、采访、播音、技术、行政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播音是整个编采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又处于直接与亿万听众交流思

①本文写于1995年。



想感情的第一线，需要全身心投入准备工作。我和共同担当播音任务的齐越为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参与编辑、记者研究讨论广播稿件，细心领会稿件内容，仔细揣摩怎样掌握宣传的精神，如何把稿件的重点、感情准确地表达出来。

当时的技术装备是很简陋的。为了使整个广场都能听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普通的扩音机是不能适应的。于是，由1940年创建人民广播时负责技术工作的傅英豪同志设计并制作了几部新型扩音机，把九只喇叭装置在一起，分设于广场的适当位置，形成强大的音量，我们把它称之为“九头鸟”。虽然解决了广场内部的音响问题，但是，朱德总司令将要从东长安街那边阅兵的音响还无法传送到设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再转播出去。工程师黄云同志在检阅车的挡风玻璃板上安装一支话筒，在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小喇叭，另在记者和技术人员的采访车上，装备一部钢丝录音机，在演习的时候，尾随在检阅车之后。事前录下音来，精确计算了时间，在开国大典这天播放这一录音，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9月下旬要向各地方电台发出联播的通知，9月30日还要向全国听众和新华社、各报社发出预告。这项全新的节目应该取个什么名称呢？梅益、温济泽等同志一起商量，想出了“实况转播”这个业务用语，即把现场的真实情况和音响，通过广播的技术设备和播音员的解说，转播给全国乃至国外听众。大家都认为这个新的词语恰当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义，所以一直沿用到今天。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了。10月1日下午2时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城楼，播音工作的位置安排在城楼西侧。没有播音室，只有一个话筒立在那里，这是一支普通的话筒，但今天却显得那么不同寻常。我穿了一件蓝色双排扣列宁服，与齐越并肩肃立在话筒前，像是待命投入战斗的士兵。2时过后，主持大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提前来到主席台，以他一贯严谨的作风，仔细检查了各项工作。

我和齐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广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嘹亮的歌声、不尽的红旗，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城楼上下，所有的人们都在等待着，等待领导着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一代开国伟人的来临，等待那个庄严的划时代的时刻。2时55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长长的台阶上，健步走上天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门城楼。当他们一一从我们面前经过,走向主席台时,我和齐越激动地对
着话筒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霎时间广场一片沸腾,口号
声连绵不断。

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盛典开始,请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主席以洪亮而又浓重的湖南乡音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一语千钧,宣告了中华民族历史上
灾难深重的黑暗岁月的结束,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的开始。这划时代的
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滔滔东海之滨,莽莽青
藏高原,解放区的天和那些未被解放的国土,并且飞越疆界,远达海外。
广场上刚刚静下来凝神倾听伟人声音的30万群众又欢腾起来,齐声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海潮般
的声浪回荡在广场上空。

我和齐越兴奋而又认真地交替朗读着广播稿,把眼前这一幕幕动人
的场面及时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当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奏国歌,请毛
主席升国旗”时,毛主席在主席台上庄重地按动电钮,只见鲜艳的五星红
旗在广场中央徐徐升起。五星红旗伴随着激扬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飘
扬在蔚蓝的天空。

我望着冉冉上升的国旗,激动地对听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她升起。”我及时地向听众介绍了当时广场上



的情景：“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各队带队指挥员行举手礼，在队列中间的干部和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工作人员都肃然立正。”国旗在升高，我越说越兴奋、激动：“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对于那个时代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的年轻人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我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在革命队伍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一段段往事，油然浮现在眼前……

抗战爆发前，我在天津三八女中上学时，受到一些地下党师生的影响，参加了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我学会的第一支救亡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支催人奋进的歌，鼓舞着我们挺起胸膛参加“呼吁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卢沟桥事变后，我们许多平津流亡同学长途跋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沿途行军也高唱着这支歌。如今她成为我们的国歌，她教育我们不要忘记灾难的过去，更应万众一心，坚定勇敢地开拓未来。

在延安学习一年，1938年底我响应党的号召到了华北敌人后方，开始做妇女工作，1942年后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还在报社。一天，突然接到电讯，日寇投降了！报社当晚紧急突击出了号外，发表了日寇投降的喜讯和朱德总司令宣布各解放区部队进军接受敌伪军投降的命令。为了把这个特大喜讯很快地传播出去，我们成立了宣传队，到附近党政军机关驻扎的村庄去宣传。我普通话讲得不错，就让我宣读进军命令和胜利喜讯。拂晓回报社途中，大家在一起说笑，有人说：“丁一岚，你的声音还挺响亮，将来我们解放大城市，有了广播电台，你去当播音员好了。”当时是随便说说的，想不到还真的成了现实，那时我24岁。从那以后，我在张家口和后来设在阜平的新华广播电台当播音员，以话筒为武器，把一条条令我广大军民振奋、令敌人丧胆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全国。

眼前，铁流滚滚东来，各兵种分列式从东长安街陆续进入广场。齐越以他特有的庄严、浑厚的声音向听众介绍着各个兵种，对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及空军编队经过天安门的雄姿一一作了详尽的介绍。当最后一个方队走出广场后，参加欢庆盛典的群众队伍连续不

断地通过广场。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整个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的灯大放光明。正阳门外，五彩缤纷的焰火腾空而起。直到晚上9时20分，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庆祝大会结束了，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走下主席台，到城楼两侧向停留在广场中的群众和值勤的同志们挥帽致意，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群众也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至此，我们宣布实况转播结束。

孰料最热烈的高潮却在这时出现了。当广场前方的军乐队奏着欢快的进行曲向金水桥畔走来时，广场后部的群众高举着鲜花、红旗和灯笼，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像彩色的巨浪，涌向金水桥边。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微笑着向群众亲切招手。毛主席向城楼下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城楼下的群众“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更高昂了。城楼上下，互相呼应。人民爱戴领袖，领袖热爱人民。这是发自心底的爱，是民心所向的爱，是最为真诚的爱。但是，由于我们的转播已经结束，没能将这动人的场面介绍给全国听众，至今想起来，仍然深感遗憾。

转播这次盛典实况，是缜密组织的集体创作，除了直接参加工作的各级领导、编辑、记者、技术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大批间接参加的同志的辛勤劳动。每当我回忆起46年前的这一次转播时，心中对他们

充满敬意。我尤其怀念我的播音伙伴齐越同志。开国大典时我们没有留下播音时的照片，真是件憾事。恰巧，1985年北京广播学院组织拍摄纪念人民广播创办35周年历史回顾电视片，他们约我和齐越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再次来到开国大典时我们播音的位置上，补照了一张照片。谁能料到两年前，齐越同志离开他热爱的播音事业，离开他亲密的战友和亲人，永远离去了！我珍藏着这张在天安门上的合影，它使我永远不会忘记开国大典那一天。



1985年丁一岚和齐越在天安门。

【作者简介】



姚伦（1914—2002），黑龙江双城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红军，任中共山西临县县委书记。1941年到中央社会部工作，1946年到晋察冀社会部任审讯科长，后历任华北公安部审讯科科长，公安部一局审讯科科长，公安部直属一处处长，预审局副局长、局长。1983年任公安部顾问。

第二编

秦城监狱的由来^①

□姚伦

功德林监狱

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地址在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故也称功德林监狱。这座监狱是民国4年（即1915年）建造的。

1949年5月，华北社会部进驻北平。我当时在华北社会部二室任审讯科长，审讯科有三个看守所，分别由蒋孚民、田世昌和白世栋担任所长。我们押解着300多名犯人从河北平山县进入北平，进京后审讯科及看守所就设置在德胜门外的原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这座监狱当时是由两个部门管辖，犯人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军区军法处关押的犯人；另一部分就是我带领审讯科管的犯人。犯人们由两个部门分别安置在东西监房内，各自管理。办公室也是一个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自办公。1952年，军法处搬走后，所有房屋全部移交公安部一局四处（执行处）。

在“功德林”，我们面对的是简陋的工作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同

①原载《百年潮》2001年第4期。

时担负着繁杂的和大量的工作任务。审讯室就设在监房，家属也跟着我们居住和生活在监房。1952年我们在“功德林”的大墙外边盖了一部分简易平房，作为监狱干部的家属住房。但由于数量很少，有一部分干部和家属还得住在监房中。

随着预审工作的深入开展，犯人也陆续增加。除了我们审讯科入城时带进的几百名在押犯以外，以后又先后收押了一些“三反”、“镇反”等运动中清理出来的犯人以及一些专案犯人，监房愈发显得紧张。1954年以后，全国六个大区的战犯管理处撤销，全国除保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外，主要战犯多集中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此外，在这里还收押了一些外籍犯和特殊犯人。因此，当时犯人的管理问题成了预审工作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而首先急需解决的就是监房拥挤和管理上区别对待的问题。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我们所接管的功德林即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是不合格的。整个监狱从结构到设施都非常不合理，处处都是为摧残人犯而设置的，体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暴虐和不人道的本性。在这座监狱里没有放风场地，没有审讯室，也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厕所都没有。每个监舍的面积很小，还不足二平方米。为防止犯人逃跑，整个监狱的外形呈八卦形，每个八卦角是一栋监房，全部是砖木结构，监舍的出口很少，每扇门都设在“八卦”的角上，反锁着，地面铺的青砖，监舍阴暗潮湿，再加上年久失修，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每逢刮风下雨，我们更是为犯人的人身安全担心，甚至在夜里连觉都睡不安稳，半夜常常跑到监房里去查看情况。当时，很多要犯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犯人身体虚弱，如果管理不好，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思想压力也是很大的。这方面的工作是代表党和国家形象的，是讲政策的，讲人道主义的。而“功德林”的状况和条件远不能体现出这些，远远达不到党对犯人改造和管理工作的要求，这样的监狱是不能再维护下去了，我们确实需要建造一所能适应新中国公安工作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现代化监狱。

新监狱选址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我们有许多困



难和问题要去解决。特别是美蒋反动派还很猖狂，空投特务、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时有发生。针对当时的形势，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确定了建造新监狱的原则：监狱不要建在北京城里，离京城要远些，可以建在郊区或更远些的地方，甚至可以靠近山区、大同或内蒙古等边远地带。

1955年秋，我当时担任公安部直属一处处长，主管预审工作。根据罗瑞卿部长的指示精神，我和当时的办公厅副主任于光文及秘书朱慧开始了为新监狱选址的工作。

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监狱最合适，当时我们心中还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决定先围绕北京城外的东、南、西、北方圆几百里去实地考察，哪里合适就选定在哪里。我们三个人每天清晨出发，带上干粮和两暖瓶茶水，乘吉普车在漫无边际的京郊大地上苦苦寻找着、观察着，这种寻找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我们的行动是明确的，无非是远离京城的郊外或山区，以及有山有水又交通便利的地方。

我们首先奔向北京南郊的周口店一带，走遍了周口店周围十几里的平原，以及方圆二三十里以外的平原山丘，凡是吉普车能开进去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一漏过。就这样我们漫山遍野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理想的地方。

随后，我们改道奔向京郊的西山一带。在六爷坟周围，我们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址，这里山水幽幽，景色宜人，山上长着巨大成林的白皮松，山脚下是开阔的平原，绿草茵茵。这里的水质也很好，交通也比较便利，确实是建造监狱的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我们当时很高兴，马上报告了部领导。为此，徐子荣、杨奇清副部长等领导都相继亲临此地视察，也都感到满意。但后来将要具体运作时，北京军区的领导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公安部在这里建造监狱距离军区的设施太近，不同意我们在此地施工建监狱。无奈，只好因此作罢。我们继而又转向京城北面的回龙观地区，继续为新监狱选址。经勘察，这个地区的土质很差，多是很厚的沙土层，这种土质不利于打地基，只好放弃了。

经过大半年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秦城。此地位于北京西北远郊的昌平区境内，坐落在燕山脚下，与十三陵相连。南面是天然温泉小汤山，东邻陶峪口水库，西面是四通八达的大汤山。此地远离城市，一面依山，人口稀少，地理环境适于犯

人的改造和关押。虽然当时比较荒凉，遍地荒山野草，野狼出没，但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好的。这里的交通也比较便利，几条公路通向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我们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认为此地建造监狱是很合适的，后经罗瑞卿部长拍板，决定将公安部的直属监狱建在秦城。并因地名而将这座监狱称为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的设计

监狱的地址选定以后，还有一系列问题要逐一去解决。如征购土地、修建公路和桥梁、设计监狱的图纸以及施工建造等等。

首先是征购土地的工作。这块地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地方，价格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生长着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土地要价就更高，一般一棵果树要作价四十元，因为这些都是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来源和依靠，我们也本着“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精神，尽量兼顾群众的利益。另外，我们还征购了从小汤山到秦城沿途十几华里的农田，建造了一条公路，并修建桥梁，很好地解决了秦城监狱的交通问题，为监狱的施工和利用开辟了良好的途径，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接着就是设计和修改图纸的工作。究竟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监狱，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本着革命人道主义思想彻底改变国民党等历代统治阶级对待犯人那种不人道的做法，在图纸的设计上处处体现出共产党的政策，要把犯人当人对待。根据当时苏联专家向我们提供的图纸，我们结合实际需要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设计，从保密、安全、坚固的角度出发，使布局更加合理化，更加科学化。在设施和设备上进行了改进，并增设了卫生设施，以保证犯人的洗澡和卫生，设计了医疗室和锻炼身体的环境，这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监狱的区别。当年国民党的监狱没有卫生设施，厕所多是设在露天的槽形水沟，至于让犯人洗澡讲卫生就更谈不上了。

秦城监狱建成后，功德林监狱的犯人都搬到了秦城，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秦城监狱从1960年建立，至今已有40年了，它在国内外是比较知名的，也是比较现代化的高级监狱。从整体来说，它的布局是合乎实际要求



姚伦(坐者)和秦城监狱长、政委。

的，坚固、实用、严密。它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把犯人当人对待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

秦城监狱一开始就由公安部直属一处（预审）管辖，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这里先后关押过国民党首要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美蒋特务等。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座监狱却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先后逮捕关押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入狱达10年之久，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并在此上了法庭，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李雪峰（1907—2003），山西永济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河北开展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长，直（隶）中特委书记，冀豫晋省委组织部长、书记，冀豫晋区委书记、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中原局第三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华中局常委。建国后历任中南局组织部长、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央交通工作部、工业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九届中央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召开八大前后片断回忆^①

□李雪峰

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大会。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全国亿万人民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激情如火山喷发一般炽热，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迎来了我党八大的召开。八大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纪念党的八大召开40周年之际，我回顾当年的情景，仍然十分激动。

①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956年9月15—27日,李雪峰(中前排左四)出席八大,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

党的八大是1956年9月15日在现在的政协礼堂开幕的。我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之前我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加了八大从筹备到召开的工作。

1947年我随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南下到了中原,任中原局副书记,并受中原局之命负责组建了河南省委。武汉解放后,中原局改建为中共中央中南局,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及武汉市,我任中南局副书记并兼任了一段时间的组织部长,还兼任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1952年邓子恢从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叶剑英从华南分局调来,不久也调中央工作,直到大区解散之前由我在中南局守摊子。我在中南局时,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方面要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同时要恢复经济,安顿人民的生活,并着手进行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广大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南地区在短短的几年里,支援了解放战争和接管了新区。同时,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以及在城市进行了民主改革,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也对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

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中央于四五月间在京召开会议,决定

撤销各中央局。4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地区工作部，同时建立了中央秘书长会议制度。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刘澜涛，兼任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兼任中央华东地区工作部部长；宋任穷，兼任中央西南地区工作部部长；马明方，兼任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部长；林枫，兼任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兼任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还有杨尚昆、胡乔木。当时，几乎每天都召开中央秘书长办公会，讨论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记得毛主席召集了一次秘书长会议，他对大家说：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中央地区工作部是在大区解散后设立的过渡性机构，时间很短，1954年下半年中央撤销了中央地区工作部，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了四个办公室。中央一办主管政法工作，由彭真任主任，罗瑞卿任副主任；中央二办主管农业，主任是谭震林，副主任是张子意和刘建勋；中央三办主管工业交通，主任李雪峰，副主任李立三；中央四办主管工、青、妇群众团体，主任刘澜涛，副主任李颀伯；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副主任是曾三、邓典桃、田家英、龚子荣。中央三办撤销后，中央设立了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我兼部长，副部长是李立三、高扬和于江震。这是党的八大前中央机构的一些情况。八大以后，中央把工业和交通分开，我任中央工业部部长，曾山任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

1955年3月，中央开始起草党的八大会议文件。刘少奇同志主持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周总理主持《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工作，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工作由邓小平负责主持。中央副秘书长不仅要参加修改党章工作，也要参加其他筹备工作会。党章修改工作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毛主席让把党章修改报告写得短些，小平同志说3万字吧，不再压了。这样修改党章的报告草成得比较早。政治报告是陈伯达主笔，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稿子写了半年，直到1956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仍没完成。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政治报告的农村部分，约9000字。由于政治报告起草没有完成，时间紧迫，中央把大家集中到北戴河写。毛主席要求大家抓紧时间写，并把原定9万字的政治报告压缩成5万字（实际完成是6万字），调参加修改党章报告的胡乔木同志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小平同志的精力也集中到那里。

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